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

张明海 汪紫睿

文明的演进始终和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深度同频共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列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并提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列入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之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引导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既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新时代社会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是文化自信的深刻表达

从文化视域来看，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是生态文明的基本实践样态，彰显为一种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自信。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所积淀的丰富的生态智慧，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道法自然”的实践观、“众生平等”的伦理观等，为当代绿色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生态文明基因。在全球化与生态危机并存的今天，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不仅是生态文明实践模式，更成为文化自信的深刻表达。这种自信不仅植根于中华生态文明智慧，也来自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对生态文化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并最终开花结果于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之所以作为文化自信的一种深刻表达，关键还在于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上也实现了革命性突破。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和强烈的生态意识，正是新时代道德建设所需要倡导的伦理观、道德观和进取精神。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得到广泛践行等，就应该把全社会是否广泛形成了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作为重要的观测面和衡量指标，并以此为遵循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只有当绿色理念真正成为生产的普遍形态、生活的自觉选择、文化的内在基因时，文化自信才能有更坚实的社会基础，中华文明才能为全球生态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展现出古老文明在新时期的蓬勃生机与无限活力。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是社会治理效能的深刻反映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核心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与社会治理效能之间，体现为一种深刻的辩证统一关系，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不会自动形成，它需要强大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来引导、规范和推动。

一方面，科学的治理政策能引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落地。例如，我国从国家层面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绿色发展理念，将“引导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在社会层面推行“厕所

革命”“垃圾分类制度”“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等，充分体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在设定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愿景、统一思想认识上的宏观效能。引导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必须始终坚持系统思维、全局谋划，深入推进生态治理的系统优化，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系统攻关，完善推进和实现碳达峰的系列规范体系、标准体系，科学规划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系列布局。只有通过制度设计将绿色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社会运行规则，使各方面制度更加定型，才能引发全社会对绿色治理的积极响应，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良性闭环。

另一方面，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又是社会治理效能的“晴雨表”和“试金石”，它综合反映了社会治理体系的战略远见、制度效率和社会动员水平。一个能够有效推动并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社会，其社会治理也必然是现代化的、高效的且具有前瞻性的，而这正是评价社会文明成熟度的重要衡量指标。随着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入推进，绿色发展方式不仅关乎生态环境和国计民生，更关乎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塑造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为此，需要充分发挥生态文明建设对各领域发展的强大引擎效应，健全促进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形成的激励体制机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文明建设的深层互动，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以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涵育社会文明新风尚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本质上是一种以生态价值观为核心的新型发展观和生活观。物化意识是人的发展片面性最集中、最深刻的表现。我们

面临的这场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其实质是要克服以资本运行逻辑和物质占有为最高目标的异化价值理念，构建起经济理性、社会公正和尊重自然价值内在相统一的绿色发展理念体系。对于这一新型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追求，离不开一种“生态新人”或“文明新人”的孕育与成长。也就是说，建设美丽中国，最终要实现的是生态与人文的交融，除了建设宜居宜业的美好生态环境，也要以生态文明新风涵育人性之美。

生态文明新风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绿色生活方式就是其基本的日常生活样态，它以一种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范式，超越了传统的环保概念，在推动社会生产与消费模式的结构性变革中蕴含着深刻的人的全面发展和文明进步意义。因为，它能以绿色消费模式倒逼绿色生产方式的形成发展，以绿色价值观涵育大众的公共精神和责任意识，筑牢时代新风最深厚的精神底蕴，以绿色治理理念匡扶社会运行秩序的失衡，以绿色生态文明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为此，应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生态文明理念，让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垃圾分类等成为人们的普遍生活习惯，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当全社会得以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人争做“生态新人”或“文明新人”成为一种社会新时尚时，这本身就是文明程度明显提升并达到新高度的最鲜活注脚。

【作者分别系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长沙理工大学马基首席专家、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二级教授；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长沙理工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建设方法与路径研究”（21ZDA077）阶段性成果】

深刻把握『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周树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将“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深刻揭示了发展与安全互为前提、彼此支撑的辩证统一关系，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核心的党中央驾驭复杂局面、应对风险挑战的战略智慧，更为“十五五”时期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了战略根基。

统筹发展与安全是宝贵经验。发展与安全是一对重大关系，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相生相伴。不同历史阶段，党根据面临的形势任务，不断调整优化发展和安全的思路、目标和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主要体现在安全主导发展的格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主要体现在发展主导安全的格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体现在安全和发展统筹兼顾的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对国家建设过程中发展和安全内在关系的深刻认识，也是对传统安全和发展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来看，现代化进程往往是一个充满风险挑战的过程，其基本特点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相互交织、内部安全问题与外部安全问题传导叠加，处理不好极易造成经济社会发展迟缓、现代化进程迟滞乃至中断。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使命光荣、任务繁重、挑战巨大，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须把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重大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在多个重要场合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标志着我们党对发展和安全关系的认识走向成熟。党的十九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

党的二十大在回顾过去十年工作时明确提到“统筹发展和安全”，在阐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这一重大原则时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论述“推进国家安全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这一重大问题时强调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这充分表明，“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必须坚守的重大原则。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必然选择。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两大奇迹”，实现了“三个起来”，取得了“四个伟大成就”，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到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就“十四五”来说，中国经济总量接连跨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台阶，预计将于2025年底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是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中国后续发展永续发展需要强大的国家安全能力做支撑，中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海外利益和公民安全需要得到有效维护。

另一方面，各种敌对势力绝不会让我们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某些国家沿袭冷战思维，试图利用其经济、科技和军事上的优势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某些国家秉持意识形态偏见，将中国发展视为他们的“奶酪”分了他们的“蛋糕”，于是便处处心积虑地制造对立，妄图阻挡中国发展的步伐。基于此，除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中国别无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未来5年，我国各种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因素将明显增多，统筹发展和安全任务更加艰巨。”我们必须学深悟透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大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安全能力建设，以强有力的安全为“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保驾护航。

（作者系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分中心研究员）

发挥好职校人才孵化器作用，壮大乡村人才队伍

王翔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职业学校涉农相关专业作为推动高素质农村专业人才培养建设的重要平台，必须让涉农专业教育发挥好农村人才孵化器的作用。

聚焦乡村需求优化涉农专业设置。在体系建设上，需进一步强化职校涉农专业的办学条件和教学能力，支持具备条件的涉农职校探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在培养模式上，基于夯实基础鼓励探索定向培养模式，聚焦乡村产业需求并结合农民学习特点，采取半农半读、育训结合方式开展融合教学。同时，鼓励现有中职、高职和本科院校涉农专业面向返乡青年、退役军人、农村留守妇女等群体开放招生，拓宽生源渠道，推行弹性学制和课程，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技术技能人才供给平台。在教学方式上，应推动教学方式、产业特征和数字化趋势深度融合，积极打破传统课堂边界。一方面把课堂设在

田间地头、养殖基地和生产一线，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开展“田间教学”，通过现场示范、手把手指导，强化实操技能传授；另一方面充分运用数字平台，建设涉农在线课程资源库，支持农民和从业人员利用碎片化时间自主学习，实现线上理论传授与线下实践锻炼的有效贯通。

聚焦赋能增效深化职校产教融合。针对当前部分涉农专业供给过剩、脱离生产实际、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优先对低效专业进行“减法”调整，通过撤销冗余专业、联合合并同质化专业，破除“专业与产业脱节”的壁垒；在此基础上构建“加法”支撑，围绕农业创新链、产业链需求，打造紧密对接乡村产业的现代化涉农专业集群，确保专业设置始终与乡村发展需求同频。共建产教协同机制，激活融合核心动能。鼓励职业学校发挥自主能动性，与农业企业共建“产教联合体”，推动农业企业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共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强化因材施教、提升学生实操技能。探索以市场为导向深化涉农专业的产教融合，积极引导人第三方公司，实行

市场化运作，创建涉农人才供需服务平台，为涉农人才培养提供链式服务。同时，进一步压实地方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政治责任，鼓励和引导职能部门根据本地区发展所需，探索制定符合农村发展所需、契合院校发展所长、适合市场应用所需的产教融合机制。

聚焦常态长效推动各类人才扎根。需以精准施策为导向，引导职校涉农相关专业毕业生等扎根乡村、服务乡村，扎实推进“三支一扶”、科技特派员、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推动各类专项计划落地见效，包括支持“科技小院”产学研融合模式扎根乡镇，推进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实施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与乡村巾帼追梦人计划，引导更多职校涉农专业青年人才和专业力量下沉乡村，为基层治理和产业升级输送“新鲜血液”。加强本土人才自主培养。应健全各类制度，联合企业、学校共同制定涉农人才培养方案，同步推进专业设置、课程开发、师资队伍建设，确保专业教学内容与岗位能力要求精准匹配，实现人才链、

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鼓励本土经验丰富的乡村人才带头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与青年学员结对帮扶，推动乡土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内生动力。提升人才服务保障水平。解决好返乡入乡人员的居住和子女入学问题，便捷社保关系转移、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基础服务，为返乡入乡人才扫清后顾之忧。鼓励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特别是职校涉农专业教师带着技术、项目到乡村和涉农企业开展创新创业，积极推广“乡村振兴顾问团”等模式，推动专业技术人才通过项目合作、短期服务等灵活方式参与乡村基层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全方位支持。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市基地特约研究员、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本文为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服务乡村振兴的湖南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及对策研究”（XSP22YBZ008）阶段性成果】

思想经纬

汇聚全球治理合力的中国担当

谢爱莲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与冷战思维、霸权主义、保护主义阴霾交织碰撞，全球治理体系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习近平主席在天津举办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系统回答了全球治理“由谁治理、如何治理、为谁治理”的时代命题，为汇聚全球治理合力、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注入了中国智慧，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

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是时代必然。它并非偶然的理念创新，而是深刻把握历史演进规律、直面现实治理难题的必然选择，其逻辑根基深植于时代发展的客观需求。

从现实需求看，全球性挑战的蔓延加剧了治理合力缺失的痛感。地缘冲突叠加、恐怖主义蔓延、重大传染性疾病频发、气候变化紧迫，诸多挑战超越国界，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善其身。然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抬头导致多边合作受阻，部分国家将“家规”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使全球治理呈现“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碎片化状态。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凝聚共识、重塑合力，而全球治理倡议正是回应这一需求的系统性方案。

深入把握全球治理倡议的理论内涵。全球治理倡议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大创新发展，

构建了结构明晰、逻辑严密、内容完整的科学体系，为汇聚全球治理合力提供了重要的价值遵循和行动指引。

“五大核心理念”构成了全球治理倡议的理论支柱，形成了有机统一的整体。其中，主权平等是基石。确立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均享有平等参与权、决策权与受益权，直指全球治理中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的痛点，为广泛参与奠定基础。国际法法是准则。主张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双重标准”与规则滥用，维护治理体系的公正性。多边主义是路径。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反对单边主义，通过多边合作机制凝聚治理共识。以人为本是目标。聚焦民生关切，推动治理成果全民共享，着力弥合南北发展鸿沟，回应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诉求。行动导向是支撑。注重系统谋划与务实合作，通过具体项目打造可视成果，破解治理滞后与碎片化难题。

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发展、安全、文明三大倡议形成协同效应。全球发展倡议为治理合作奠定物质基础，全球安全倡议为治理实施提供安全环境，全球文明倡议为治理达成提供人文支撑，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能够增进各国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为全球治理凝聚共识。而全球治理倡议则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为发展、安全、

文明领域的合作提供制度保障，确保四大全球倡议相互促进。

全球治理倡议的落地成效与中国作为。在凝聚理念共识上，全球治理倡议正获得更多国家认同。倡议提出后，就得到俄罗斯等国家的积极响应。与此同时，中国借助“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等平台，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开展政策沟通，让主权平等、普惠包容的治理理念深入人心，为凝聚南方国家合力搭建桥梁。

在完善治理机制上，中国采取“存量改革”与“增量创设”双轨并行策略。一方面，参与联合国、世界银行等传统机构改革，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调整，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矫正发达国家主导的结构偏差。另一方面，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多边机构，其治理结构凸显主权平等、共商共建原则，为全球治理提供新范式。针对气候变化、网络空间等新兴领域，中国牵头组织多边对话，促成合作共识，填补治理空白，为新兴领域治理发展指明方向。

在开展务实合作上，中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载体转化治理成果。通过推进互联互通、减贫合作、数字经济等领域项目建设，将“注重行动导向”的理念落到实处，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分享治理合作红利。

以全球治理倡议凝聚持久治理合力。面对

依然复杂严峻的全球治理形势，推动全球治理倡议深入实施，汇聚更为强大的治理合力，需要秉持开放包容精神持续奋进。

坚持守正创新，巩固多边合作根基。始终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守国际法基本准则，同时顺应时代发展需求，推动治理机制向更加均衡、民主、包容的方向演进。在国际金融架构、人工智能等治理赤字突出领域，优先推动共识凝聚与成果落地，以早期收获激发更多合作动能，为全球治理注入新活力。

深化南北协作，扩大治理共识版图。充分倾听全球南方国家诉求，通过技术支持、能力建设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推动建立更加平等的伙伴关系，让治理合作真正体现各国意志、符合各国利益，形成“共商治理、共享成果”的良性循环，使全球治理更加公平、合理。

强化行动协同，破解碎片化困境。推动四大全球倡议深度融合，在发展中筑牢安全基础，在文明交流中凝聚治理共识，通过机制联动实现“1+1>2”的合作效应。鼓励各国结合自身实际参与倡议实施，形成各具特色又相互呼应的治理实践，携手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有效的方向发展。

（作者单位：湖南开放大学）

新论